

柏林争斗

莱恩·德顿著

倪世雄 易华译

(美) 巴伦坦书刊公司

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

BERLIN GAME

BY

Len Deighton

First Ballantine Books Edition

January, 1985

封面设计：王申生

特约编辑：吴金海 葛伟昌

柏林争斗

莱恩·德顿 著 倪世雄、易华 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字数190,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10293·151 定价1.50元

出版说明

《柏林争斗》是著名作家莱恩·德顿的一部近作。这部小说以众所周知的柏林危机为背景，展现了英国情报机关与苏联克格勃之间在东、西柏林以及伦敦等地进行的复杂而激烈的间谍和反间谍斗争。主人公伯纳德·萨姆森是英国的一名重要间谍人员，最后发现他的妻子菲奥纳原来是一个打入西方的克格勃高级官员。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引人入胜。作者生动有力的笔触不仅深入到战后的欧洲现实生活，而且还揭示了西方情报机构的内幕情况，对我们了解西方社会和形形色色的国外间谍活动，有一定借鉴作用。然而，小说对战后欧洲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看法是错误的，这是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所致，我们在阅读时须加以注意。

这部小说自1985年1月出版后，在《纽约时报》上连续十四周评为畅销书之一。美国报刊认为这部小说是“德顿最好的小说之一”，“真实、有趣、扣人心弦”，“把间谍小说的文学性和戏剧性推向一个新高度”。

作者莱恩·德顿生于伦敦，就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先后在纽约和伦敦从事艺术、广告和写作，后长期居住在美国，现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定居爱尔兰。他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依珀克利斯档案》，接着他又连续写了多部有影响的间谍

和侦探小说，如《水底飞鸟》、《间谍的故事》、《昨天的间谍》、《柏林的萍礼》、《再见吧，米老鼠》、《追捕一个沦落的间谍》等，从而蜚声于西方文坛。

此次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求知书刊社编辑，复旦大学倪世雄、易华同志翻译。对于他们所作的工作，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第一章

“我们在这里坐了多久了？”我边说，边拿起双筒望远镜望着玻璃岗亭里那个烦躁不安的年轻美国士兵。

“快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沃纳·沃尔克曼说。他的双臂压着方向盘，脑袋搁在手臂上。“我们第一次坐在这里等狗叫时，这位美国大兵还没有出生呢。”

在阿德龙旅馆废墟后面俄国人的军营里，狗吠通常是出事的最早迹象。任何异常的活动，狗都比人先感觉到，这就是我们要敞开窗子听狗吠，并在这里挨冻的原因。

“那时这位美国大兵还没有出生，他读的那本惊险间谍小说还没有写出来，我们两个人也以为这堵柏林墙几天之内就会被拆掉。我们那时真是傻小子。不过那时可比现在好，你说是吗，伯尼？”

“人年青的时候总是好的，沃纳。”我说。

查利检查站的这一边依然如故。这一边从来就没有什么变化。只有一座小岗亭和几个标记，告诉你快要离开柏林西部了。东德那边可就复杂多了，墙、篱笆、门、路障，没完没了地标明通行道的白线。他们最近还修建了一个有围墙的庭院，旅游车在那里要受到仔细盘查，那些面色阴郁的人在每一辆车上拍拍打打，推开车底下的轮镜，担心他们的某个

同胞会贴着车肚藏在那里。

查利检查站从没有安宁的时刻。东德那一边，探照灯的光束聚集在一起交叉扫射，不断地发出鸣响，就象炎热的夏日里一大群昆虫发出的叫声。沃纳把头从手臂上抬起来，换了个姿势。我们两人都坐在海绵橡皮垫上，这是我们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学会的一项本领。我们还学会了用胶布把车门上的开关粘住，以免一开车门，车内的灯就亮。“我要是知道泽娜在慕尼黑要待多久就好了。”沃纳说。

“我可忍受不了慕尼黑，”我对他说，“说真的，我忍受不了那些残忍的巴伐利亚人。”

“我只去过那儿一次，”沃纳说，“是去帮美国人办一件急事。我们的一个人被打得够呛，可是当地的警察根本就不管。”沃纳的英语说得结结巴巴，带着浓重的柏林音，早在读书时我就熟悉他的这种口音了。现在他已经四十岁，粗壮的个子，浓密的黑发、黑胡须，一双带着睡意的眼睛，这使他容易被误认是柏林的土耳其人。他在蒙上雾气的挡风玻璃上擦出一个窥孔，好看到外面被探照灯照亮的地方。在查利检查站黑色轮廓的后面，东柏林的弗里德利希大街被照耀得如同白昼。“不，”他说，“我一点都不喜欢慕尼黑”。

昨天晚上，沃纳多喝了几杯之后向我吐露，他的妻子泽娜跟一个替可口可乐公司开车的人私奔了。他那套漂亮的公寓房子，在格吕内瓦尔德北面的达勒姆街区，前几天晚上，沃纳一直让我睡在他家凹凸不平的沙发上。但是等他清醒过来后，我就装着以为他的妻子是去探望一位亲戚了。“看，有什么东西过来了。”我说。

沃纳纹丝不动，“是一辆棕色的‘福特’，它马上要通过检

查站，然后在那儿停下。车里的人马上要喝咖啡，吃红肠面包。午夜一到，他们将返回西柏林。”

我注视着。沃纳说得对，这是一辆棕色的“福特”，一辆小型运货汽车，没有标记，只有西柏林的登记号。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他们通常停车的地方，”沃纳说，“这些搞上东德女孩的土耳其人。按规定在境外只能待到午夜。午夜后他们又回西部来。”

“那一定是些特别的女人！”我说。

“一把西德马克在那边很管用，”沃纳说，“这你知道，伯尼。”一辆载着两个警察的巡逻车慢慢地驶了过去。他们认出了沃纳的“奥地”，其中一个举起一只手疲惫地行了个礼。警车开走后，我举起望远镜向路障看去，一名东德的边防哨兵为了不被冻僵正在那儿跺脚，天气太寒冷了。

沃纳说：“你能肯定他是从这里过境，而不是从博霍墨大街或者普林森大街的检查站过境吗？”

“你已经问过我四遍了，沃纳。”

“记得我们刚开始为情报部工作的时候，你爸爸是这里的负责人，那时情况和现在可大不一样。记得老冈特——那个能唱许多有趣的柏林卡巴莱民歌的胖老头——他和我打五十个马克的赌，说它永远也不会建起来，我指的是柏林墙。当时我才十八、九岁，那年头五十马克可是个不小的数目。”

“那是赛拉斯·冈特，从伦敦来的指导报告他读得太多了。”我说，“有一段时间他努力使我相信，你的看法都是错的，包括对柏林墙的看法。”

“可是你什么赌都没打。”沃纳说。他拿起热水瓶往纸杯倒了些清咖啡，然后，把杯子递给我。

“但是我自告奋勇在他们关闭边界的那个晚上到那边去。我一点也不比老赛拉斯笨，只是我拿不出五十个马克来打赌。”

“是出租汽车司机首先知道情况的。大约在早上两点钟，无线电通讯警车抱怨说，他们每次过界都不得不停车受盘问。市出租汽车公司的调度，通知司机们不要送任何人到东部去。然后他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

“所以你就阻止我到那边去。”我说。

“是你父亲叫我不要带你去的。”

“但是你自己过去了，沃纳。老赛拉斯和你一起去了。”原来在封锁边界的那天晚上，是我父亲阻止我到那边去的。我直到现在才知道。

“我们大约在四点半过了边界，见到了苏联的卡车和许多士兵，他们把一卷卷铁丝网卸在查里特医院外边，我们很快就回来了。赛拉斯说，美国人会派坦克来把铁丝网扯掉。你父亲也是这么说的，对吗？”

“华盛顿的人给吓昏了，沃纳。上面那些蠢货以为俄国佬会开过来占领西柏林，等看见他们只筑了一道墙，才松了一口气。”

“可能他们掌握的情况比我们多。”沃纳说。

“你说得对，”我说，“他们知道情报机构尽是一些蠢驴在管事。可是这句话却给走漏出来了。”

沃纳微微一笑，“然后在早上六点钟左右，你听到了沉重的卡车声和建筑吊车的声音。还记得坐在我的摩托车后，看他们在波茨坦广场上拉带刺的铁丝网吗？我当时就知道，这种事终究会发生的。这是我最轻松地挣得的五十马克。我不

明白冈特先生怎么会和我打那个赌。”

“他不了解柏林，”我说，“他刚在牛津教完一年书。在那里他讲的是政治学和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年青人需要用的统计学。”

“或许你也应该到那儿去教书。”沃纳带点讽刺地说，“你没有上过大学，是吗？”这是句反话，“我也没有上过。不过你没上大学干得也不错。”我没有回答，但是沃纳谈兴正浓。“你见过冈特先生吗？他的德语说得多么好啊！不象你和我——他说得漂亮极了。”

沃纳在搞走私活动，好象比我混得好一些。他看着我，期待我回答。“我和他的外甥女结婚了。”我说。

“我忘了老赛拉斯和菲奥纳还沾亲呐。我听说她现在是情报部里的一个重要人物。”

“她混得不错，”我说，“但是她太卖力了，我们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

“你们肯定挣了一大笔钱，”沃纳说，“你俩都是高级官员，你还有外勤津贴……而且菲奥纳还有她自己的一笔钱。她父亲不是个什么巨头吗？难道他不能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你安排份轻松的工作？总比在这里，坐在柏林的一条偏僻的马路上受冻强。”

我看着路障重新放下，哨兵走向他的岗亭，我说：“他不会来了。”挡风玻璃又蒙上了一层雾气，使检查站的灯光变成了仙境似的朦胧的光点。

沃纳没有回答。录音机接着蓄电池，遮阳玻璃后面装着话筒，我腋下夹着的一支左轮枪使人很不舒服，鼓在那里象是个军号。我还没有向沃纳透露过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过了

几分钟，他倾身向前，重新在玻璃上擦去一块水汽。“情报站不知道你在用我吧？”他说。

他极希望我说柏林站已经原谅了他以前的过失。“他们不会介意的。”我撒了个谎。

“他们的记性好得很。”沃纳抱怨道。

“给他们些时间。”我说。实际上，沃纳在计算机的档案中被列于“只能参加非关键性工作”。这其实就是不让他参加任何工作。因为干这种工作，每件事都很重要。

“那么，他们不信任我啰。”沃纳说道，他忽然猜到了真情。

“你管那个干什么？”我说，“你挣的钱还少吗？”

“我对他们会有用的。部里也能帮我挣更多的钱，这我以前对你说过。”

“我去跟伦敦的人谈谈看，”我说，“看看能不能给你帮帮忙。”

沃纳并没有被我的许诺打动，“他们只会向柏林询问情况，你知道柏林会怎么答复他们的。”

“你的妻子，”我说，“她是柏林人吗？”

“她才二十二岁，”沃纳不无思念地说，“家在东普鲁士。”他把手伸到衣内，象是在找香烟，但他应该知道我是不会允许他抽烟的，因为天黑以后抽烟，点打火机太显眼了。“可能你看到餐桌上她的照片了——一个个子小小的，披着黑色长发的漂亮姑娘。”

“哦，那就是她。”我说，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那张照片。不过这样一来我至少已改变了话题。我不希望沃纳向我追问情报站的情况，他照理应该知道这点。

可怜的沃纳！为什么戴绿帽子的丈夫总显得那么荒唐，而那不忠实的伴侣却不成为笑料？这种事是多么不公平！无怪沃纳要假装他的妻子去走亲戚了。现在他正盯着前方。他粗黑的眉毛压低了。“我希望他带的不要是伪造的证件。现在他们什么都要放在紫外线下检查，而且每个星期都要更换标记。现在连美国人都不再使用伪造的证件了，那等于是自投罗网。”

“我不知道他带的是什么，”我对他说，“我的任务只是找他，向他询问执行任务的情况。”

沃纳转过头来，浓密的黑发和黝黑的皮肤使他的白牙象牙膏商业广告一样发亮，“伦敦不会为了这种小事把你派到这里来的。这种差使，他们只需派一个象我这样的勤杂员来干就行了。”

“我们去弄点吃的吧，沃纳，”我说，“你知道有卖香肠、土豆和上等柏林啤酒的清静些的餐馆吗？”

“这很容易，伯尼。沿弗里德利希大街一直往前走，电气火车站边的铁路桥下，靠左边，施普雷河畔就有个甘梅德餐馆。”

“有意思极了，”我说道。我们和甘梅德餐馆中间隔了一堵墙，那儿有机关枪、铁丝网和两个营的拿枪的军人。“还是让我们把这破车掉个头离开这里吧。”

他发动了引擎。“她不在家，我还高兴些，”他说，“谁愿意有个女人等在家里，盘问你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回来这么晚？”

“你说得对，沃纳。”我说。

“对我来说，她太年轻了，我根本就不该和她结婚。”他

等了一会儿，让引擎散发的热气把玻璃上的雾汽去掉一点。

“那么明天再试试吧？”

“不用再联系了，沃纳。这是接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明天我就回伦敦，我要睡在自己家的床上了。”

“你的妻子……菲奥纳。以前我不能出门走动的那段时间，她对我很好。”

“我记得那件事，”我说。沃纳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名东德间谍，结果被他们从窗户扔出去，腿断了三截，过了很久才痊愈。

“请代我向冈特先生问好，我知道他早就退休了，但是我想你还是常常能见到他。你告诉他，想打赌俄国人在干什么，叫他来找我。”

“我下周末将见到他，”我说，“我会告诉他的。”

第二章

“我以为你误了飞机。”我妻子一边拧亮床边的灯一边说。她还没有睡觉。她的长发很乱，带褶的睡裙也压皱了。大概她早就上床了。烟灰缸上有支点着的香烟，她一定是在黑暗中，边抽烟边想着工作。床头柜上放着从办公室图书馆里借来的几本书，一本蓝皮小册子——《特别委员会的科技报告》和笔记本，一支铅笔以及一包必不可少的本森/赫奇斯牌香烟。其中许多已成了烟头，掐得扁扁的，堆在她从客厅里拿进来的大玻璃烟缸里。我不在的时候，她过着另外一种生活。现在，我仿佛走进了另外一幢房子，跨进另外一间卧室，来到另外一个女人面前。

“碰上该死的机场罢工。”我解释道。

“伦敦机场吗？”她注意到抽了一半的香烟，就把它捻灭，挥手掸开烟雾。

“还会有什么地方天天罢工呢？”我没好气地说。

“新闻节目里没报道嘛。”

“罢工已不再是什么新闻了。”我说。她显然认定我没有直接从机场回家。我在那里耽搁了三小时，她并不表示同情，这使我更加不愉快。

“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沃纳向你问好。他告诉我你舅舅和他还为柏林墙的事打过五十马克的赌。”

“又来了，”菲奥纳说，“他就不会把那该死的打赌忘了吗？”

“他喜欢你，”我说，“他向你问好。”这不全是真话，可是我想让她和我一样地喜欢沃纳。“他妻子离开了他。”

“可怜的沃纳，”她说。菲奥纳很漂亮，尤其是她这样微笑的时候，这种微笑是女人们专留给失去自己女人的男人们的微笑。“她是跟着另外一个男人走的吗？”

“不是。”我撒了个谎，“她受不了沃纳和其他女人没完没了的来往。”

“沃纳吗？”我妻子说着笑了起来。她竟不相信沃纳和许多别的女人来往，我感到奇怪，她怎么猜得这么准。用我们男人的眼光来看，沃纳似乎是个能吸引人的家伙。我想我永远也不会了解女人。糟糕的是她们却了解我，对我了解得那么深刻。我脱去上衣把它挂在衣架上。“别把你的外套挂到衣柜里，”菲奥纳说，“要洗一下，放着明天我来收拾。”她尽量小心地补充说，“我往‘登山者’旅馆打电话找你，后来又问过奥林匹亚的值班员，但是没人知道你在哪儿。比利的喉咙肿了，我当时以为是流行性腮腺炎。”

“我不在那儿。”我说。

“你叫办公室在那儿给你订了房间，你说那是柏林最好的旅馆，你说我可以在那里给你留口信。”

“我和沃纳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出走了，他有间空屋。”

“也分享他那些女人吗？”菲奥纳说着又大笑起来，“这是你想叫我嫉妒的计划的一部分吗？”

我弯下腰来，吻了吻她，“我很想你，亲爱的，真的很想。比利好了吗？”

“完全好了。”

“你真是个好妻子。”说着我脱了衣服，走进浴室。

我回到卧室时，她已经梳好了头，把我那一边的床单拉平了，我的睡衣也在枕头上放好了——一件淡红的上衣和一条佩兹利细毛裤子。“这些是我穿的吗？”

“这星期拿去洗的衣服还没送来。我打过电话给洗衣店，司机病了。——你还要说什么？”

“这次我根本没有去柏林站，那里都是些屁都不懂的毛孩子，和沃纳这样的老家伙在一起我觉得安全。”

“万一发生了情况，万一出了事，连值班军官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怎么办？你难道就不明白，不给他们挂个电话打个招呼，有多愚蠢？”

“现在奥林匹亚站里没有我的熟人了，亲爱的。自从弗兰克·哈林顿接管以来，一切都变了。他们是些年轻人，毛孩子，没有实践经验却有一大堆从受训学校中学来的理论。”

“可是你接的人露面了吗？”

“没有。”

“这么说你白费了三天？”

“我想是这样吧。”

“他们会派你亲自去找那个人的，你知道吗？”

我上了床，“胡说，他们会派一个西柏林人去的。”

“这已是最老式的手法了，亲爱的。他们派你去等人……谁知道呢，那人却没照面。你只好返回，汇报一次失败的接头，这样你就成了他们需派进去找那个人的唯一人选了。哦，

我的天呀，伯尼，你有时真是个傻瓜。”

我本来没想到这一层，不过菲奥纳玩世不恭的观点启发了我。“哼，他们应该另找一个人。”我气愤地说，“让当地人去找他。那边认得我的人太多了。”

“他们会说，那些人都是毛孩子，没有经验，就象你自己刚才说的。”稍顷，她接着说道，“布拉姆斯——这些联络网的名称听上去真可笑，我喜欢以前的那些密码代号：特罗简、韦林顿、克莱勒特。”

她说话的腔调让人恼火。“战后的联络网名称是特别选择的，不带国籍标志。”我说道，“布拉姆斯四号曾经救过我的命。他就是那个帮助我从魏玛脱身的人。”

“他就是那个十分神秘的人物，这我知道。你想他们为什么派你去接他？你知道现在他们为什么要让你过境去找他吗？”床头，我的照片在镜框中直视着我。那时的伯纳德·萨姆森，还是个一脸孩子气的年轻人，长着一头卷发，架着一副牛角架的眼镜。他和我现在每天早上刮脸时在镜子中看到的这个满脸皱纹的老笨蛋简直毫无相似之处。

我接着说，“我当时的处境很糟。他本可以径自往前走不必返回到魏玛来。”我把头睡到枕头上，“距离现在大概有十八年，也许二十年了……”

“睡觉吧，”菲奥纳说，“早上我给办公室打个电话，就说你不舒服。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

“你该看到我办公桌上有那么一大堆事情要做。”

“比利过生日时，我带他和萨莉到希腊餐馆去了。侍者们祝他生日快乐，在他吹灭蜡烛时向他祝福，他们真好。我真希望你当时也在场。”

“我明天早晨就对老头子说，我不去那边接人，再也不能干那种事情了。”

“银行的莫尔先生给你打了个电话，他想和你谈谈。但他说不着急。”

“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我说，“这就是说要我一回来就打电话给他。”我把身子靠近了她。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她是特意为我才涂香水的吗？我说不清楚。

“圣诞节时，我们在银行的帐上已透支七百英镑。不过当我在妹妹家的晚会上见到莫尔时，他要我不必担心。”

接着我说起布拉姆斯四号把我带到一个名叫布希——卡尔·布希那里，布希在魏玛有一间空房子……我一下都记起来了。“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后来卡尔·布希又回到那里，他们把布希送到莱普齐格的军营去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你现在是高级官员了，亲爱的。”她疲倦地说，好象就要睡着了似的，“你用不着去你不想去的地方了。”

我突然对她说：“我昨天给你打过电话，在凌晨两点钟，没有人接。”

“我在家，睡着了。”她说道。她醒了，而且警觉起来了。

“电话铃响了很久。”我说，“我打了两次。最后还叫接线员帮我拨了一次号。”

“那一定是这个该死的电话机又出了毛病了，昨天下午我给南妮打电话时也没打通。明天我去叫技师来修理一下。”